

巴人全集

卷一 短篇小说

巴人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巴人全集

卷一 短篇小说

巴人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人全集/巴人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宁波:宁波出版社,2017
ISBN 978-7-302-42533-5

I. ①巴… II. ①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3337号

责任编辑:《巴人全集》编辑组

装帧设计:刘 派

责任校对:《巴人全集》校对组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626 插 页:1 字 数:10125千字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00元(全十九卷共二十一册)

产品编号:061171-01

前 言

他是革命战士。他一生为革命而奋斗,从偏僻的乡村到大都市上海,又转战异国他乡的穷乡僻壤,到解放后担任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在故乡,他与官绅斗争,是疾恶如仇的“雷雨先生”;在上海,他与汪伪、日寇斗争,是“活鲁迅”“打鬼的钟(馗)进士”,他又是上海市民的“大众情人”;在南洋,他与日寇、荷兰帝国主义斗争,被印度尼西亚人民、华侨尊为哲人智者“端·巴人”。他四次入狱坐牢,他转入“地下”,与敌人周旋,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他是文化巨人。从小说、诗歌、杂文、文艺理论、鲁迅研究,到史学、翻译、编辑出版,无不给我们留下丰实的成果。其面之广,其文之多,都是无人可以比肩的。

然而,他又是一生悲剧。他并没有在现代文学史、史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因为他的大部分著作是死后问世的,错过了不该错过的时间。而最可悲的,是他被定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进而又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叛徒,步步“高升”,最终在“文革”中被活活折磨而死。此人是谁?——巴人。

巴人,姓王,乳名朝伦,字任叔,号愚庵,官名士侠,又名子虔,学名运镗。巴人是他近二百个笔名中的一个。

巴人出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10)初八日(19)丑时(1点至3点),浙江奉化市大堰村人。新中国成立前大堰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四面环山,一条宽四五十米的山溪从村前流过,极具风水格局。巴人在《说笋之类》一文中说他“先辈尚书太公与崇祯皇帝闲谈,皇帝询及吾乡情况,尚书太公以十四字作答:‘干柴白米岩骨水,嫩笋绿茶石板鱼。’是这样世外桃源的故乡。”如今已成为大堰镇所在地。

村上最为显赫的是尚书第,俗称“狮子闾门”,是明嘉靖二年进士王钊的府邸。他是明王朝工部尚书,曾得御赐“望重朝野完名全节”八个金字。按照《王氏宗族·世达篇》称:自周、秦以来,不少人为官。十世祖是大将王翦,而至晋代的二十五祖书圣王羲之也是本家。王氏家族的远族郡望是山东琅琊,西晋末才南渡浙江,到了明代,王氏家族的五十四祖至六十四祖有十九人为官。把老祖显赫

人物，一一列出，这是一般家谱的惯例，不过明工部尚书王钊是巴人上代，名不虚传。巴人家住在尚书第内，是合族而居。祖父王开日是清朝的武举，生了六个儿子。父亲王景舒，号质夫，官名毓彬，排行第五。父亲粗通文墨，在家务农，兼做竹木生意，为人正直骨硬。年青时，不爱劳动，以致兄弟分居后，生活很苦。他生儿育女后，“常背诵些古先哲的格言，掺和自己青年时力耕的苦况”（巴人：《无实践即无文学》），现身说法教诲儿子。

母亲徐氏是一位坚强、很有主见的妇女。“辛亥革命的时候，下令剪辫子。她强迫自己的孩子，一定拿着香烛向祖庙的神像碰头礼拜之后，才允许剪下辫子来。”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固执的信神佞佛的妇女！可是当1927年大革命爆发，她长大了的孩子，一阵风似的卷入那砸菩萨、赶和尚、嫁尼姑的运动，引起了全村人的责难时，为了支持自己孩子的革命精神，抵制别人的责难，她竟“把自己祈神礼拜的香竹筒，用斧子给劈碎了！并立誓一生不再念佛吃素！”1953年，巴人回乡探亲，几十年不见的老娘已九十多岁，仅仅住了两天就回北京了。巴人说：“她一点也没有阻挡我只有两天工夫就回北京。她说：‘你们成天是打在外头的，去吧，你打天下的事情要紧。’母亲的爱总是通向正义与真理的。”（王任叔给马袞生的信）

巴人兄弟三人，他最小。他还有一个姐姐王朝彩和一个妹妹王文彩。

大哥王伯庸是一个平庸自私的人。早年在上海交通专科学校肄业，后来在家务农兼管族众事务，恪守封建之道，与巴人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

二哥王仲隅，是巴人人生道路上最初的引路人，对巴人的影响颇大，被他称为“第二父亲”。

八岁那年，入本村务本小学读书。“在乡下小学，一登就是七年。”（王任叔：《出卖伤风》）前四年，读完小学的课程。接着一年，就读《论说文范》之类的书，其中大都是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党人陈天华、邹容等人的文章，从书中第一次接触到新思想。他后来说：“这给我以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种子。”最后两年，则又“读《孟子》《论语》《中庸》《大学》和《左传》”（王任叔：《自传》）。这些古代的经典之作，对他产生程度不一的影响；而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战国时代的介子推。介子推跟晋文公流亡国外十年，回国后，当群臣争功论赏时，他却退居绵山。巴人对他这种高风亮节很为钦佩，这对他日后待人处事有很深的影响。

十六岁那年6月，二哥给他从别人那里借来一张高小毕业文凭，叫他去投考

在宁波的浙江第四师范学校。此时,父亲病危,不久病逝。父亲在弥留之际,“只是嘱大哥毋使二哥在师范中辍”,而对巴人的前途,“一句也不曾提到”。按照大哥大嫂的意思,三弟要走当时宁波大多数人所走的路:从商或务农。母亲把巴人录取师范的事瞒着巴人。后来巴人终于从别人那里得知此事,便向母亲苦苦哭诉、哀求,正在师范读书的二哥也来信催促。最后由母亲做主,走进了师范学校。他去入学,已是开学两个月后的11月了。这是巴人在人生道路上跨出的极重要的一步。

巴人在师范五年,前三年,他说自己是“一个最守本分,最少活动,也最少朋友的孤独的学生”;而且喜欢读古书,好做古诗,显得比较迂腐。但在这时结识了一个好友,叫毛信望。巴人说:“我从他那里知道了社会上的黑暗面,官僚的拍马、钻营等手段,还有所谓乡间妇女无以为生被逼出卖为妓等的社会生活,这使我仿佛另开了一只眼睛,要去看看这社会到底多少黑暗。”(王任叔:《自传》)这种愿望,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一触即发。浙江的五四运动高潮,首先从杭州的第一师范学校掀起,而宁波的五四运动则先由宁波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发起。第四师范运动的中坚则是巴人所在的班级。这个班级早在1918年首先倡议成立校学生会(自觉会),“要求改革校政,展开反学监的斗争”。这时,第四师范学校与其他学校一起,于5月9日举行集会游行,并且在19日联合市内各中学,成立宁波市学生联合会。毛信望被选为评议部长,巴人被选为执委会秘书长。此时结识了同为学界领袖的张秋人、卓恺泽等。他们展开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斗争。

1920年夏天,巴人从师范毕业,先后在镇海港口李氏义庄小学、鄞县蔡家桥蔡氏义庄小学、宁波星荫小学、慈溪普迪小学任教。在这段时间,他的志向、人生观和世界观开始初步形成。如1921年,他“决心要做一个新文学的战士”。(《自传》)1921年加入倾向进步的剡社。1922年,他要求加入共产党。1923年发起“挽经”(挽留经亨颐)运动。不过,他常常也有消沉的时候。夫妻不和、失业的苦恼,特别是探索理想的艰难,使他像当时许多先行者一样,患上时代的忧郁病。这时,他受到庄子的个体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影响。他说:“庄子的颓废思想,给我一生的影响很深。但庄子的否定一切的精神,和他某些辩证法的理论,也使我敢于否定旧社会一切。”(《自传》)巴人在星荫小学任教时,力主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他说:“这使我的思想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色彩。”(《自传》)所以这

几年巴人的思想是多种矛盾因素交织在一起,常常使他陷入迷茫和悲观。但这是探索者特有的精神状态,是他们心灵觉醒的标志。没有矛盾就不会有新的突破,没有痛苦就没有真实的人生。所以,尽管巴人感到孤独而消沉,但他的主导思想还是忧国忧民,他仍然不甘寂寞,时时向这个黑暗的旧社会表达他的不平,提出他的愤怒和抗争。1923年年底的“挽经”斗争便是显例,他也被看成“赤化分子”,普迪小学辞退了他。

1924年上半年,巴人回奉化,在松林小学任教。这时接到宁波谢传茂(四师同学,共产党员)来信,希望他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加入国民党。谢要巴人加入共产党,是因为早在1922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念书的宓如卓(四师同学)曾来宁波找过巴人、谢传茂,要他们在宁波组织一个共产党小组。巴人接到信后,立即去信表示同意加入共产党。不久,离开松林小学,来到奉化初中,在那里“自己读书写作”。这时由党组织的指派,他与该校教员共产党员冯三昧等,“悄悄地建立起”(巴人:《旅广手记》)党组织。该年的10月,巴人被邀《四明日报》当编辑。其时,他与谢传茂、赵济猛和周天僇一起正式过组织生活^①。在《四明日报》工作没有多长时间,因得罪当局,于1925年二三月间被逼离开报馆去上海卖文为生。此时,恰逢“五卅”运动,目击英帝国主义巡捕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还亲自尝到武装巡捕监视下中国人不能在自己国土上左顾右盼走路的滋味。他愤怒,于6月初返回奉化,参加6月10日的奉化声援“五卅”的万人大会,又与王仲隅等组织演讲队、演剧队到农村进行宣传。此时,与剡社相对立的法治协会以“赤化”为名,向剡社的左翼人物大举进攻。胡颖之、王仲隅、冯三昧等一批党员被逼离开奉化,从宁波调来党员赵济猛、石念白来任教。巴人仍留下任初中教务主任,办《锦报》,主编《新奉化》,仍然坚持与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敌人也加紧反“赤化”运动。巴人在“五卅”周年的表现,参与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参加奉化学联、剡社、非基督同盟、县议会等活动,并在《新奉化》、宁波《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言论,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要逮捕巴人。于是巴人连夜逃至宁波。7月他转赴广州,投奔北伐司令部。他是因蒋介石来信要他去广州的。在司令部秘书处做机要工作,后来又成了代理机要科科长。他从蒋介石给李济深的电报,和李济深给他部属的电报中,得知他们正在密谋“清

^① 也有一种说法,巴人1925年入党。

共”，于是告诉了党组织、周恩来。经组织同意，他辞去机要科长之职，奔赴上海，又转到宁波，向宁波地委负责人竺兰芳、江少怀、赵济猛等报告蒋、李密谋“清共”的情况，自己则由组织同意回到奉化从事革命工作，不久又调至宁波，委任为地委宣传委员（即宣传部长）。这时宁波开始清党，巴人被关进监狱。因抓不到确实把柄，由浙江省政府委员庄崧甫保释出狱。庄是剡社的领袖，巴人是剡社活跃分子，是奉化的才子，浙东的“雷雨”先生，在与法治协会斗争中，他那支犀利的笔，使对方丧魂落魄，庄很赏识他的才能。这次巴人入狱，就是法治协会的人向敌人告密，说奉化王任叔是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捕的。

作为革命者，巴人斗争是勇敢的；作为作家，巴人这时期所经历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生活，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创作的源泉。他对于文学的爱好，受“善讲故事”的父亲的影响，在小学受被称为“炭先生”和另一位“白墨”先生的老师的影响，在师范则受擅长古诗，好老庄之学的历史教师洪佛矢的影响。而巴人从事新文学的创作，是“五四”以后的事。他自己说是受“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的影响”（王任叔：《我和鲁迅先生的关涉》）。那时他的重要文学活动，便是1923年参加“雪花社”，作品发表在《四明日报》的副刊和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旬刊》上。

巴人经过大革命失败的短暂的炼狱之后，虽然一时找不到党组织，回到了老家，但他的革命意志并未衰退，反而对革命更热爱，更坚定。他说：“一到高潮低落的时候，我似乎获得了更大的生命力。我能以理智观察这个时代，我已指数出这期间反动势力的必然经过，与夫它落日的短促的寿命。我还走我的路，不顾一切地走我的路……我极愿牺牲。”（王任叔：《我想起了自杀》）为此，他和二哥准备在奉化搞农民运动。不料，一个在革命高潮时被农民驱逐出境的无赖，竟做了清党委员，下乡来清党了。兄弟俩不得不离开家乡，到邻县新昌、嵊县躲避，之后，又流落到宁波、上海。11月间，又到杭州高等商业学校教书，1928年年初，去上虞春晖中学教书。在春晖的一年是他政治上和爱情上的苦闷时期。

1929年年初，巴人经负责浙东工作的竺兰芳的同意和友人阿金的鼓励，决心去日本留学，研究社会科学和普罗文学。到了日本，参加留学生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一边学习日文，一边进早稻田大学读书。然而不料，日本当局制造了“十·三事件”。所谓“十·三事件”是指1929年

10月3日,日本当局借口中国留学生集会抗议蒋介石中东铁路反苏案,制造的镇压中国留学生事件。巴人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留学生的凌辱,十分气愤。他说:“于是我更憎恨这不很有理性的国家,觉得专为自己的修业而留在这个国家里,是我的耻辱,我要看我的祖国到底有没有法子,我回国了。”(王任叔:《论“没有法子”》)就这样,巴人原定留学三年,只住了十一个月,就在当年毅然回国了。日本侦探竟随轮一直跟踪他到上海。

11月,巴人回到上海后,立即参加了声援“十·三事件”中受害学生的运动,接着又参加由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发起的中国自由大同盟运动。1930年年初,又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年的1月,巴人与上海闸北区委李一氓接上党组织关系。党派他到浦江中学、建国中学任教。两校先后停办,6月,派他搞工人运动;10月,又派他到沪东做海员工作。

1931年3月,巴人经组织同意,回到文化界,参加左联工作。不幸,他的转党关系的信,因闸北区委被敌人破坏,这封信(有地址)也落入敌人手中,他于4月初一早被捕。但巴人报户口时把自己的姓改为姓陈,他不承认自己是王任叔,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经沈钧儒律师有力的辩护,驳斥检察官无端指控,最后法院以共产党嫌疑犯判他六个月的有期徒刑,于1931年10月24日出狱。这样,他又一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出狱后,知道二哥为营救他不惜抵押土地,凑了一大笔钱,贿赂了法官,得以从轻判决,而二哥却病死在上海。他说:“二兄遗下的孤儿寡妇的一群人再也没有依靠了。这使我深恶痛绝的家庭观念和抚孤恤幼的责任感不期然产生了。我想找一个职业来尽一些义务。”(王任叔:《我要自杀》)

1932年1月,经人介绍,携夫人王洛华和幼子克宁来到武汉当教师。教了半年,竟领不到分文薪水。教员们组织“跪哭团”,也跪不到钱。于是又托人,经人介绍给交通部长朱家骅,在南京航政司航政科任科员。这样,巴人一家于1933年1月到了南京。不幸,1935年3月15日,由于受进步的磨风剧社案牵连,巴人第三次被捕。后经妹夫毛裕芳托当时在南京的堂叔、蒋介石幼年的老师毛思诚(其时为蒋介石写传)和同乡王光埏托立法委员楼桐荪作保,巴人终于被释放出狱。在释放的前一天,特务把别人起草的一个脱党宣言拿来要他签名。巴人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此时并非党员,当局也清楚。巴人到南京后,叛党分子刘苏屏向特务告密,为此跟踪、监视巴人两年。但他们一定要巴人签名。巴人

“把凡是有直指斥党的句子,都给勾了去,使它只成为自己认错的文字”。^①(《自传》)但巴人的想法毕竟太天真了。特务把《宣言》发表在1935年4月20日《南京日报》《新民报》上时,仍是一字不漏地恢复了删去的句子。这成了巴人一生极为痛苦的事。从此,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在“文革”时,这还成了所谓“叛徒”的罪名。巴人被捕,是国民党交通部次长张道藩指使的。张道藩名下的剧社演出,巴人曾化名批评过。巴人夫妇又支持与张道藩相对抗的磨风社演出《娜拉》。这些自然会引来顶头上司的不快。巴人出狱后,立即提出辞呈,离开南京。

这年的6月到了上海。他当时的思想心境和态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立誓从此隐姓埋名,卖文过活。如能从文字上为党呐喊一下,即为党所不齿,我也甘心。”(王任叔:《我和鲁迅先生的关涉》)巴人这样想,也这样做。可以说,从1935年下半年起到1941年年初离开上海止,这五年多时间内,最能显示巴人革命战士和文化巨匠的特色,是他一生生命力发挥得最完美、战斗性最强的时期。他基本上摆脱了以前的自卑和苦闷。这原因,首先是因为党对他的关怀和鼓励,使他振奋精神。如1936年12月,冯雪峰到访,还和夏衍、胡风在他家开了一次会。巴人从此又与党恢复了联系,这无疑给他无穷的力量和勇气,使他逐渐摆脱了那种隐姓埋名、自惭形秽的精神状态。其次,由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的展开。他说:打破自己“这悲剧性的命运的,是卢沟桥的烽火,是八字桥的枪声。”(巴人:《生活、思索和学习》第51页)一种强烈的爱国热情,驱使他精神饱满地投入抗日的洪流。最后,脱党多年的他,于1937年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巴人几经曲折,终于坚定地无条件地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交给了党和革命,使他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为抗战、为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抗日救亡活动方面来说,巴人在1936年下半年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如1936年年底积极参加营救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等七君子的工作。而特别重要的贡献是创办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后改为社会科学专门学校)。讲习所不仅培养与造就了进步文化界的骨干,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而且还直接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输送了一批骨干。这在“孤岛”极其复杂的特殊环

^① 注:此原件在中联部档案室王任叔档案内。

境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团结各界的著名人士,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巴人不仅团结文化界人士,如郑振铎、陈望道、周予同、严景跃等,还团结商界人士,如陈己生、胡咏骐等,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有的还入了党,走上革命道路,这和巴人的努力分不开。

当然,巴人的抗日救亡工作主要的大量的是在文化方面。1938年1月,巴人参加党领导下的文委领导工作。首先要解决上海人民精神食粮问题,抗战不能没有文艺的武器。出版报刊、丛书,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这年的下半年,为团结留沪的作家,组织了一个上海作者协会。“任叔对组织非常热心,隐然成了会中的核心。”(孔另境:《记“廖化时代”的王任叔》)同年11月,上海文艺界的党组织成立了一个“文艺中心小组”,由巴人负责。1938年在短短三个月内,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套洋洋大观的二十册《鲁迅全集》,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罕见的。这套全集的出版,大大推动了全国人民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潮流,这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鲁迅全集》名义上是蔡元培、宋庆龄为首的“鲁迅纪念委员会”编辑出版,主持编辑、出版工作的是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胡仲持等人,但主要的具体工作是巴人做的。解放后巴人给夫人马袞生的信中也说,《鲁迅全集》是由他一人编成的。

巴人除了文化工作以外,还做党的群众工作。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有个时期叫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有四大群众组织,即职工界协会、妇女界协会、学生界协会和文化界协会。巴人是文委领导成员之一,要出席各种会议。1938年,汪伪和日寇势力还未伸展到“孤岛”,而到1939年年初,他们的魔爪伸向“孤岛”,巴人的积极行动,引起敌伪的注意,常常有人对他盯梢、跟踪,并企图进行绑架、暗杀。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更为残酷而严峻,根据周恩来的紧急指示,要巴人去美国办《华侨日报》。3月,巴人偕夫人王洛华,携幼子克宁、克平去香港。由于巴人英文不过关,办护照有困难,美国去不成,就留下在廖承志、刘少文领导下工作。7月,组织决定将巴人疏散至新加坡。王洛华因水土不服,孩子年幼,就返回上海。

巴人到新加坡后,一边在陈嘉庚办的南侨师范学校当国文教员,一边致力于党的统战和文化领导工作。此时结识郁达夫,又碰到诗人杨骚。在新加坡组织了“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巴人任宣传部长。他们为新加坡文化界和侨胞做了不少抗日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

1942年2月初,日本侵略者日益逼近新加坡。巴人、郁达夫、胡愈之、沈慈九、雷向予等人离开新加坡到苏门答腊的萨拉班让。3月12日,苏门答腊和爪哇相继被日军占领,与马来西亚仅一海之隔的廖州岌岌可危。杨骚听到这个消息,就跑来找巴人、雷向予两人,邀他们到彼处去住。为了便于掩护,建议结上亲戚关系:“小雷算是我的妹妹,你作了我的妹夫。”雷向予又名雷德容、雷恂予,当时化名刘岩。他同巴人在南侨师范时认识的,是巴人领导的党小组成员。全面抗战爆发时肄业于北平中国大学以后,从平津辗转至四川,皖南事变后赴新加坡。他们便欣然接受杨骚的建议,结为假夫妻,不久又结为真正的亲密伴侣,在日后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的日子里,相濡以沫,生死与共,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1943年9月20日,日军发动大检举运动,敌人在苏岛到处张贴巴人照片,要把他捉拿归案。经过四个月的东躲西藏的逃难生活之后,于1944年2月初,与雷向予、阿金等三人,来到新邦罗乐附近,在那里买下园地种菜,养鸡、狗和猫,同时还手编秘密报,由雷向予手抄,阿金向外送。但形势更为严峻,他们又转移到一个叫甘光泗拉巴耶的小村。这里是最破败最荒僻的山芭,住着马来西亚人和马达人,几十年前还吃人肉,保存着许多原始风俗。巴人他们开始种植养活自己。由于沉重的劳动,加上饮食极差,1944年12月底巴人染上伤寒,病情严重,巴人写下遗嘱。但在雷向予的精心照顾之下,两个星期以后,高烧渐退,一个月后,基本痊愈。他又开始劳作。

1945年8月25日,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喜讯。他立即去先达,后又到棉兰,主要是搞民主爱国运动,成立了“苏岛华侨民主同盟”,巴人是这个组织的核心领导,并负责主编该盟的机关刊物《前进周报》。他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斗争,他还负责撰写印尼文《民主日报》的社论,并写了不少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文章,对印尼革命提出许多有益观点。为此,印尼革命政府欲聘他为顾问,巴人坚辞未就,只担任华侨总会联合会的顾问。由于印尼人民的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引起荷兰帝国主义的恐惧。1941年7月21日,荷兰帝国主义开始对印尼共和国采取“警卫行动”。巴人和阿金被捕。名义上是作为战俘被逮捕,实际上是国民党领事暗中策动,企图把巴人引渡到国内杀害。巴人被关进监狱,经多方营救出狱,即被驱逐出境。这样,巴人从1941年7月去新加坡,到1947年10月离开,前后将近六年半时间,其中四年时间是在逃亡生活中度过的,但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始终不忘抗日,不忘祖国,不忘印度尼西亚革命,

不忘人民群众,渡过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难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执着的革命信念,也表现出了一个人民作家的良知和责任。他带着无限眷恋的心情离开了为之奋斗并称之为第二祖国的印度尼西亚。

巴人和雷向予到了香港后,在乔冠华领导下从事外事工作,也参加由连贯负责的华侨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不幸的是雷向予因劳累过度,旧病(肝病)发作,于1948年5月24日病逝。从此他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伴侣。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两个月后,巴人奉命离开香港,奔赴解放区党中央所在地报到,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担任第二室综合研究组组长,第二处副处长以及侨务委员等职,主要任务是研究东南亚各国的革命情况。

1950年8月,巴人去外交部报到,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偕夫人马袞生出国赴任。他于1952年2月回国卸任,任外交部党组成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巴人不喜欢这类工作,要求回到文艺界搞创作。公余写作,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出版了《文学论稿》。1954年4月,调入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总编辑。1957年以后,任社长兼党委书记。正当他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因巴人发表《论人情》一文,到1959年,他为此先遭到党内的批判;1960年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时,在康生的授意下,又将他定为文艺界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掀起一场全国性批判,前后长达一年之久。接着巴人写的《以简代文》等十六篇杂文,也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也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所有的著述不准出版、发表。1961年2月,他被调至社内当编译室主任;4月,又调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亚非研究所任编译主任。他开始了印度尼西亚历史的研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成了“老牌修正主义”,又被作为“大叛徒”隔离审查。尤其最难受的是妻子被迫与他离婚,爱女高潮被迫与他“划清界线”。这对他精神打击非常大。1969年11月13日离婚后,他在16日、28日、12月12日,三次突然中风,大小便失禁。14日,人尚未清醒下,挣扎起来写遗嘱,仍念念不忘他的《印度尼西亚史》。在这种寂寞、孤独的日子里,他一面自己料理生活,买菜、做饭,用麻袋去背煤饼,一面还坚持写《印度尼西亚史》。然而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1970年1月22日,他撞倒在马路边的电线杆旁,被路人抬到派出所,却无人过问。晚上醒来,自己置身于附近部队营房外面。儿子克平从上海赶来,为他治疗,四处奔走,向有关单位苦苦哀求,结果既不准住院治疗,又不准动

用被抄的存款支付医疗费用,只好由家人踏着自行车送他到医院自费看病。更有甚者,一个月后,中联部军管小组下达把巴人遣返回乡的通知。3月8日,巴人被押送到老家大堰。遣送人还向公社宣布对巴人的四条规定。其中规定,巴人有病,应在附近就医,不得离开公社;可以看报,听广播,但不能使用无线收音机。说完,当众夺下巴人随身带去的半导体收音机。后来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发表,对巴人打击极大。对刘少奇尚且如此,自己的结论更不会据实处理。他的希望破灭了,精神也彻底崩溃了,从此他脑子进入半糊涂状态,即使如此,一旦头脑稍清醒一点,仍删改《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就这样,巴人从1967年到1970年,虽贫病交迫,戴着“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失去了自由,仍写完了七十三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初稿。这是何等顽强的革命意志。

1971年年初,巴人发生脑血栓病变。隆冬,他披头散发,敞胸露怀,穿着短裤,挂着糖果,赤着脚在雪地上跑。有一次,竟倒在雪地上。为此,他的子侄多次写信给中联部军管组,要求同意巴人到外地治疗,结果都未被应允。这激起大堰群众、干部的义愤。他们纷纷写信给中联部。到3月,中联部派人来,只同意巴人到奉化溪口疗养院治疗。同年10月,转到杭州精神病院,病情未见好转,医院的造反派因他是“叛徒”身份,一再逼他出院,不得已又回到大堰。1972年7月22日,巴人嘴唇突然发紫,呼吸急促,到奉化医院经抢救无效,23日下午,口里不断流血,心脏终于停止跳动。时年七十二岁。

巴人作为革命者,有太多悲剧因素,令人悲伤;但作为文化巨匠,他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戏剧、文论、史学、翻译以及编辑出版等方面,作出如此巨大贡献,令人称奇。

巴人的小说创作始于1922年,发表在该年8月21日《文学旬刊》第47期上的《母亲》。他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于20年代和30年代,以后还陆陆续续写小说,一直到1953年。现在我们已知他大约写了137篇短篇小说,13篇中篇小说。新中国成立前出版有《监狱》《破屋》《殉》《死线上》《阿贵流浪记》《影子》《在没落中》《乡长先生》《流沙》《捉鬼篇》《皮包与烟斗》《佳讯》《赵然先生列传》《某夫人》《证章》和《沉滓》;解放后出版《六横岛》《姜尚公老爷列传》《冲突》《风子》《女工秋菊》《明日》《隋民》《莽秀才造反记》《巴人小说选》《龙厄》,除此还有散见报刊上的大约47篇小说。

巴人的小说,大致上可分三大系列:浙东山区的贫苦农民形象系列、自我形

象系列和五光十色的都市人群系列。

对浙东山区的贫苦农民的描写,我们称为乡土小说。巴人的乡土小说从人物描写来说,二十年代大都写浙东山区的农民。这些人物,大致上有三种性格模式,即“不满型”“奴性型”和“反抗型”,这三种性格模式经历了不断转换的过程。所谓不断转换过程,是指巴人在不同时期,他的描写对象虽是农民,可是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巴人在“五卅”和大革命时写的农民,大都是“不满型”。如1924年写的《雄猫头的死》中的雄猫头,1925年写的《疲惫者》中的运秧驼背,1926年写的《孤独的人》中的白眼老八。雄猫头、运秧驼背和白眼老八,在他们身上都闪烁着反抗的火花。但是经过大革命之后,巴人笔下出现了另一种农民形象,这就是“奴性型”或“麻木型”的农民。如1928年写的《顺民》中的老狗,《殉》中的三田虬,一个想当“顺民”,却被枪决,一个听凭命运的摆弄,最后上吊自杀。而这时又出现“反抗型”农民,如《冲突》中的阿翘,他身上既有“奴性型”的思想素质,又有“不满型”的素质,两种素质不断消长,最后走上反抗道路,成为革命的农民。

巴人乡土小说的农民性格模式的演变和发展,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农村急剧动荡的变化,为作家塑造不同的人格模式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是作家自身主体意识和人生经验也日益变化成熟。巴人对农民的剖析,从最初运用人道主义到逐渐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正由于这一点,巴人的乡土小说内容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如果我们把巴人乡土小说做一分期,那么他早期,即1922年到1927年是侧重描写农民的穷苦,但也有部分作品则表现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和斗争。如《黑夜》《冲突》《黄缎马褂》。而到1928年至1936年,则侧重揭露农村中基层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和凶恶本质,如《灾》《血手》中的地主,《族长的悲哀》中的村长,《乡长先生》中的乡长,《勘灾》中的县太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巴人乡土小说中一条越来越清晰的农民与地主阶级对立和矛盾的线索。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是由鲁迅所开创的,巴人乡土小说很明显地受鲁迅的影响。巴人自己也多次谈及。因此,巴人的乡土小说也和其他乡土小说一样,有它的共同点。但巴人的乡土小说也有着自已鲜明特点。

首先,如前所说,巴人乡土小说有一条越来越清晰的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立和矛盾的线索。而大多数乡土小说,侧重表现农民悲惨的生活,很少表现这种阶

级对立的关系,也只有在许杰、赛先艾、潘训的个别作品中出现过。

其次,巴人乡土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农村的赤贫者、光棍。他说:“在现实社会里,我对于社会的畸零者残余者,感到绝大的同情。他们大都有一副强壮的身手,足以负起一部分生产事业,然而他们没有土地,没有生产工具,有时连劳力也无人买。有时,以更大的跌价出卖劳力。”(王任叔:《无实践即无文学》)

这首先得益于巴人对农民的深切的了解和感受。巴人在二十七岁以前基本上没离开过故乡,更可贵的是他还参加了故乡的第一次革命斗争。他说:“我学习写作,正在暑假,因为我是小学教员,平时除稍微读些书外,便很少有工夫写作。一到暑假,我就像大赦犯似的,抱着一脸高兴回到乡下去。我的工作是这样开始的,一方面跟乡里思想相同的朋友,杂谈一切人生问题;一方面却拣着晚上乘凉的时候,跟乡下人谈家常事情。于是我偷偷地把这些东西记下来。每个暑假,我总可以记下好多东西。……可是一到后来,离开乡村,却时时叫我记起那些被记下的人物,仿佛那些人物,并不是活在这现实社会上,而是活在我的那些草稿里。”(王任叔:《深入农民群众》)巴人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这不同于其他的乡土作家,远离故乡,凭着童年的记忆来描述故乡的风貌,正如鲁迅所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

另一原因是巴人的创作思想远超出人道主义。巴人在“五四”时受到民主、科学、进化论、实验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到了1925年年底写的《风子》中已开始对人道主义作出否定,而在1927年写的《题于〈监狱〉之后》的文章中更明白地说:“人道主义不过是一个虚玄的名字,在人生的字典里是翻不出来的。”因为自1924年入党前后,巴人已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作家对客观对象的感受和把握,而后进行表现和描写,是要受作家的政治观点和美学观念指导,受作家的兴趣、气质和个性影响的,歌颂什么,揭露什么,都能体现作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

由于上述原因,当大多数作家还停留在对农民不幸的命运同情的时候,巴人则比他们表现得更深刻些。

巴人除了写乡土小说以外,还有一类基本上以作家本人的经历作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我们把这类人物形象,称为自我形象,把这类小说称为自传体小说。巴人自传体小说,在1926年以前,受郁达夫的影响。他说:“1921年下半年,思

想上受影响最深的,则是郁达夫颓废小说——《沉沦》。”(《自传》)因为巴人“五四”高潮以后的时代苦闷,和个人旧式婚姻的不幸,很容易对郁达夫的小说引起共鸣。加上那时又和郁达夫式的小说家王以仁和诗人冯三昧等在一起,更加深了这种影响。他们一起弹起“悲哀的调子”。(王任叔:《悽情》)巴人自传体小说,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追求个性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着重描写他们的性苦闷,前途无着的苦闷;一类是投身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前一类大致是反映“五四”以后,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段时间内的生活、思想情况;后一类则写他们大革命斗争的情况。前者如《遗恨》《风子》《债华》,这些作品都表现主人公的性苦闷,而这种苦闷产生于主人公追求婚姻自由与封建礼教的矛盾,或者是说对异性的爱慕和本身包办婚姻之间的矛盾。而大革命之后,着重表现主人公对革命前途的追求与失望,向往与彷徨,如《三封信》《我想起了自杀》和《遗恨》。

巴人另一类自传体小说是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如中篇小说《阿贵流浪记》中的阿贵、《死线上》中的叶剑影,长篇小说《明日》中的唐白歧。《阿贵流浪记》中的阿贵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他是诗人,是和尚,也是小说家、学者,最后还是爱国者;他有知识,有正义感,爱国、自尊,然而又颓废、动摇、自私、自卑,而且往往后者是主要的,他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死线上》上的叶剑影,是具有两重性格的革命者,他既参加革命,又怀疑革命;他悲观、失望、动摇,但他被捕后没有叛变、投敌,临刑前,从容镇定,视死如归。叶剑影这种人物是真实可信的。关于这个人物,巴人曾作过解释,他说:“我未尝不想把我们的主人公写得坚定一点,但我的笔终于不许我过于夸大。”又说:“如果有人对革命真像空气一样的需要,对于革命思想真像磐石一般的不动摇,那一定是横绝一世的天才,人以上的超人,在我是无能力于描写这种人了。”这部小说写于1927年12月,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1927年“四一二”前后风云变幻的小说,也是我国早期普罗小说。还有自传体长篇小说《明日》。作者说:“我在我的《明日》里,曾经造出三个人物:一个是个人主义者;一个是社会主义者;而另一个却是徘徊两端的人。我在最后终于把这徘徊两端的人枪毙了。在我不过想:在今日徘徊是不可能了,无论如何要拣一条路走,所以徘徊两端的人都应该枪毙,然而不曾枪毙的人却都是不曾被枪毙呀!”(《死线上·弁言》)作者在小说中所着力表现的徘徊两端的,就是唐白歧。